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越南新領導人面臨的政經困境與改革前景

The Vietnamese New Leaders' Political Dilemma and Future Outlook

doi:10.30390/ISC.199805\_37(5).0003

問題與研究, 37(5), 1998

Issues & Studies, 37(5), 1998

作者/Author：金榮勇(Rong-Yung King)

頁數/Page：35-4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8/05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5\\_37\(5\).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805_37(5).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越南新領導人面臨的政經困境 與改革前景

金 榮 勇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員)

## 摘 要

從去年九月開始，越南政壇就進行一次領導階層的大換血，三位六十餘歲的少壯派領袖取代年平均近八十歲的老一代領導者。另一方面，越南近年來在政治和經濟上均面臨嚴厲的衝擊和挑戰。本文從越南的人事互動、政策轉變、以及未來走向等層面探討越南近期的發展。本文的結論是在經濟上越南勢必和東協各國做進一步整合；政治上則以維持現狀為最可行之路，政治民主化之路在越南可能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關鍵詞：越南政治、越南與東協、越南與中共、東南亞戰略

\* \* \*

## 壹、前 言

越南政府於去（九七）年十二月底正式完成新領導群的接班工作，任命現年六十六歲的黎克飄將軍（Gen. Le Kha Phieu）為新任的越共總書記，取代年逾八十歲的前任共黨總書記杜梅（Do Muoi）。加上稍早以前所任命現年六十三歲的新總理潘文凱（Phan Van Khai）和現年六十歲的新國家主席陳德良（Tran Duc Luong），這三位少壯派（和前任三位平均七十七歲相比）的領導人將帶領越南進入二十一世紀。這次領導階層的新舊交替延後一年多才定案，選出的總書記人選也出乎一些政治觀察家的意料之外。①是什麼原因導致這些變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原任的三位領導人是在一九九六

註① 權威的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ER*）在去年十月初的報導中就認為五十九歲的阮文安（Nguyen Van An）可望接任總書記一職。*FEER*, Oct. 2, 1997, p. 16.



年時才被越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再度選為往後五年的國家領導人，為什麼一年後就換成新一代的領導群？這是本文所要分析的重點之一。

越南在一九九五年七月正式加入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成為其第七個會員國。對於一個原來相當封閉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剛加入另一個內部成員國彼此互動十分頻繁的區域組織，越南起碼需要一段不短的時間來做調適。另一方面，加入東協不論在政治、經濟、及社會各階層都對越南造成極大的影響，在政治、經濟方面固然有許多正面的效益，但是也產生許多問題，甚至讓越南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這些影響也是促成此次領導群世代交替的主因之一。本文另一部分所要探討的重點就是越南加入東協之後在政經方面所產生的效益和困境。

越南新領導群包含一般所常區分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總理潘文凱和國家主席陳德良屬前者、而總書記黎克飄上將原來擔任軍方總政治部主任，則被認為是保守派。經歷過去幾年的快速經濟成長、而現在則面臨到一連串的國內外難題，自然也包括東南亞金融風暴所衍生的諸多問題，越南領導人是會採取更積極開放措施以期更進一步融入東協甚至全球自由經濟貿易體系中、還是會退縮以先求自保的政策？本文也做一評估。

在本文中將首先分析越南加入東協以來對內外政經生態的衝擊和所產生的困境；接下來則是探討此次越南領導人新舊交替的可能因素及未來政策重點；最後就越南未來政經發展前景做一個預估。至於本文的主要論點是越南的政治經濟生態在面臨加入東協後以及東南亞金融風暴的雙重壓力之下已經產生許多困境，而以黎克飄總書記為首的保守派將主導政局、並且將採取較保守及穩健的經濟政策來應付未來的挑戰；越南很可能在今後十年內走向類似印尼過去所實施的政經發展模式。這也就是說今後越南將會在經濟上努力維持發展，但是政治上的自由化與民主化可能會再等一陣子、等到有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出現才有可能；時間則起碼要到二〇〇六年越南正式加入東協自由貿易區以後、隨著整個區域內大部分產品能夠自由流通的衝擊下才能加速刺激政治上的改革。

## 貳、越南加入東協的外交成效

最近幾年可能是越南自從統一以來內外政經環境變遷最多的時期，自然這對越南政經生態來說也是利弊參半。首先經過多年的努力，越南終於在一九九五年七月中和美國恢復正式外交關係；並且在兩星期後正式加入東協。和美國關係正常化是越南從一九八五年以來外交政策的最主要目標。<sup>②</sup>在這十年當中河內政府一直堅持採行「持續和平」（protracted peace）政策，而且在協助失蹤美軍的尋找一事上儘量配合美方的要求，才能逐漸使得美國社會從越戰失敗的心理陰影中走出、願意和越南修好。<sup>③</sup>

註② Brantly Womack, "Vietnam in 1995," *Asian Survey*, Vol. 36, No. 1 (Jan. 1996), p. 80.

註③ *Ibid.*, pp. 80~81.



美國政府先是在一九九四年二月解除對越南長達十九年的經濟制裁，再在美國商人的施壓下同意美商投資越南做生意，最後才恢復外交關係。無疑這是越南對外關係的一大突破。越南和美國關係正常化對越南最大的實質利益是來自美商的投資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機構的援助將會大量增加。

越南對外關係的另一個突破是加入東協這個區域組織。東協從一九六七年成立以來的最主要宗旨就是利用區域經濟合作的方式來對抗共產黨的顛覆、尤其是以當時的北越和中共作為假想敵。<sup>④</sup>越南統一後的對外擴張政策更使得東協各國十分緊張，東協並因此舉行成立後的首次高峰會以討論如何應付越南。一般來說東協各國能接受一個統一並實行共產主義的越南，東協也呼籲和中南半島各國維持良好關係以及發展更大的合作關係。<sup>⑤</sup>然而這種期望很快就落空了。隨著越南在一九七八年底入侵柬埔寨並成立橫山林(Heng Samrin)傀儡政權、東協和越南的緊張關係達到最高點。為了阻止越南控制整個中南半島，東協一方面利用此一區域組織的整體外交力量在聯合國抵制橫山林政府的代表權；另一方面在軍事上配合美國、中共的軍事援助去幫助柬埔寨反抗軍打游擊戰。<sup>⑥</sup>我們可以說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東協各國和越南的雙邊關係是處於嚴重對立甚至衝突的狀況。這種情勢一直到越南逐步自柬埔寨撤軍後才大幅改觀。

自越南完全從柬埔寨撤軍後，越南和東協各國關係全面改善。印尼總統蘇哈托將軍首先訪問河內並簽訂雙邊經濟合作協定；馬來西亞立即在河內設立領事館。相對的河內政府也致函東協表明加入此區域組織的意願。<sup>⑦</sup>經過這些良性的互動後，越南加入東協已經是水到渠成之勢，所差的只是時間早晚和美國的同意與否而已。

越南想要加入東協的主要考量除了突破國際孤立外、就是想要在戰略上藉東協的整體力量來平衡中共的壓力。雖然越南和中共的雙邊關係在進入九〇年代以來有大幅度改善，包括雙方高層官員互訪、貿易額大增、以及中共到越南超過六千萬美元的投資，然而越南對於中共在後冷戰時期的區域強權態勢仍然十分疑慮，特別是中共對南中國海的主權訴求和雙方可能的軍事衝突更令越南忐忑不安。加入東協，除了一方面緩和中共的威脅外，更可以利用東協年會及相關會議諸如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來和中共商討區域安全事務。通常在多邊會談中，中共比較不能夠占對手國的上風；尤其東協許多會員國都和中共有領土主權爭端，透過東協整體力量，越南和中共談判的籌碼相對提高許多。所以加入東協，越南的戰略地位及實力

註④ 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615~616.

註⑤ Dewi Fortuna Anwar, *Indonesia in ASEA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4), p. 184.

註⑥ 有關資料可參閱 Chang Pao-min, *Kampuchea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pter 7.

註⑦ *Asia 1992 Yearbook* (Hong Ko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p. 214.



大增。這也是 Allen S. Whiting 從戰略角度認為河內今後起碼可以避免「不是和中共衝突就是屈服於北京」的兩難困境之主要理由。<sup>⑧</sup>

然而這並不是表示越南要利用東協來對抗中共的霸權，而是越南和東協各國一樣要在美國、日本、中共之間玩動態性的權力平衡（dynamic balance of power）的遊戲。<sup>⑨</sup>譬如在人權及政治民主化方面，越南和東協各國、中共都是長期被西方國家所批評的對象，這些國家常常口徑一致反對西方國家的干涉內政。馬來西亞的馬哈迪總理和新加坡的李光耀前總理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通常日本在這些事情上會十分聰明的不表意見。<sup>⑩</sup>可是在軍事安全方面，東協（包括越南）需要美國有形的軍力或無形的安全承諾來平衡中共的區域強權、或者壓制可能重新興起的日本軍國主義。<sup>⑪</sup>至於在經濟貿易領域，東協各國一方面需要美日的投資與科技、另一方面又害怕成為日本的經濟殖民地，因此常有拉攏中共（華人資金）和美國資金來抗衡日本資金的情形發生。<sup>⑫</sup>透過這些不同議題、不同國家或區域組合的合縱連橫，越南以及東協各國希望能夠在最小的代價下得到最大的利益。

以往東協在這些方面做的十分成功，替東協整體的聲望提升及其各國的利益維護盡了很大功勞。不過太多的權謀可以得利於一時，長期來說對東南亞各國是否全然有利還很難說。此次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一個範例。東南亞各國對於各自的不民主政治一貫以「亞洲式民主」、「亞洲式價值」來反駁西方國家的批評、來合理化各國不公平的政經制度，並放任各自的政商勾結，短期造成快速的經濟成長和國家地位的提高。可是隨著時間的累積，所有這些缺點逐漸顯示出來並且越聚越多，終於導致一場經濟大災難。<sup>⑬</sup>這場經濟災難不但使得所謂的「亞洲式民主」、「亞洲式價值」的可行性大打折扣，也使得東亞許多國家的經濟開倒車，起碼需要三、五年才能夠重新站起來。從這個例子來看，東協各國的權謀往往只是把短期的利益延長為日後必須付出的代價而已。

註⑧ Allen S. Whiting, "ASEAN Eyes China: The Security Dimension," *Asian Survey*, Vol. 37, No. 4, (April 1997), p. 318.

註⑨ 作者以此一名詞來解釋東協、中共、美國和日本在軍事安全、人權及政治民主化以及經濟貿易等議題上彼此因立場不一致而做不同組合的結合。

註⑩ 日本由於有二次大戰占領東南亞各國的歷史，再加上戰後近乎掌控東南亞各國的經濟貿易，一直受到東南亞各國輿論和人民的嚴厲批評，並且在一九七四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各國時發生大規模示威。這使得日本對東南亞各國的內政採取比較尊重的態度，即使施壓也以暗中實施為多。參閱 Adam Schwarz and Michael Vatikiotis, "Indonesia: Price of Security," in Nigel Holloway, ed., *Japan in Asia* (Hong Kong: Review Publishing com., 1991), p. 99.

註⑪ 有關越南和美國、中共以及日本的戰略關係請參閱 Frank Frost, *Vietnam's Foreign Relat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3), pp. 30~48.

註⑫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在一九九三年時就曾經帶領一個三百人的代表團（其中一半是企業家）赴大陸訪問，尋求經濟合作機會。《亞洲週刊》，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七日，頁十六。

註⑬ 有關此次東亞金融風暴的成因及影響，可參閱拙著「東南亞金融風暴的起因、影響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七卷第一期（民國八十七年一月），頁一~十四。



### 叁、越南目前的政經困境

相較於對外關係的突破、越南加入東協後內部政經生態卻面臨非常嚴重的挑戰。以政治生態的影響而言，越南（未統一前的北越）是東南亞各國當中共產黨執政最久的國家，她也是亞洲各共產黨國家中唯一經由自身力量奮鬥而達成執政的國家，她更是唯一打敗法國和美國而獨立的前殖民地國家。所以越南共產黨一直認為它在越南現代史享有獨特的地位，也應該長期主導越南的政治。然而這些以前的輝煌歷史，反而成為統一後越南從事國家建設時卻遭遇嚴重挫折的主要因素之一。<sup>⑭</sup>越共領導人在過去數十年爭取國家統一的過程中儘管遭遇到各式各樣的困難，靠著共產主義的理念和意識形態都能順利克服。這些成功的經驗使得越共領導人在治理國家政經大小事務時，也習慣以共產主義的角度去思考解決之道。這種情形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政經形勢極度惡化後才不得不採取開放改革措施。

造成越南政府難以應付政經事務的另外一個因素是領導階層年齡的老化。根據一項資料所顯示，在一九八〇年代越共政治局掌權的那些人絕大部分在一九四〇年代初期時就已經是黨的領導階層了。有許多人更是越南共產黨成立時的元老。這些革命老伙伴就算彼此間有理念或者是政策的不同，也通常用妥協而不是鬥爭的方式來解決歧見。<sup>⑮</sup>所以我們看到前越共總書記黎端（Le Duan）從一九六〇年一直做到一九八六年去逝為止，接任者長征（Truong Chinh）在三十年前就擔任過此一職務。在一九八六年越南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黨總書記和總理范文同（Pham Van Dong）都已經是八十老人了。范文同一年後去逝，繼任者仍然是一九三〇年越共創黨元老之一的范雄（Pham Hung）！<sup>⑯</sup>寄望這些老領導人去做大刀闊斧的改革是不切實際的。

在那種政治環境下，越南政府所呈現出來的風貌是尋求共產黨或政府內部的團結與和諧為最重要的任務，爲了要取得領導人之間的共識往往耗費時日。再加上越南共產黨從胡志明（Ho Chi Minh）以來就一直實施的集體領導體制，不論在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妥協及權力平衡往往是最重要的遊戲規則之一。<sup>⑰</sup>至於在處理政治、經濟、或社會等大小問題時所需要的效率以及正確的對策，就時常成爲團結和諧的犧牲品了。一名越南掌管意識形態的專家就解釋爲什麼一九八〇年代的經濟政策錯誤百出：是因爲領導人間的本位主義以及彼此間的妥協方案所導致。<sup>⑱</sup>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一九九〇

註⑭ Michael C. Williams, *Vietnam at the Crossroads*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2), p. 19. 此作者也提到在越南並沒有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宗教（如印尼的回教或菲律賓的天主教）或文化來和共產黨的理念相抗衡，也是越南難以擺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原因之一。

註⑮ *Ibid.*, p. 24.

註⑯ Gareth Porter,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tic Soci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09.

註⑰ Michael C. Williams, *op. cit.*, p. 24.

註⑱ *Ibid.*, p. 117.



年代整個國家政治經濟狀況面臨嚴重問題時才逐漸改變。當在上位者淪落到為自身利益而非國家利益做政策考量之基礎時，越南各級官員的貪污腐化、無效率，以及越南一般小市民的民怨高漲也就不足為奇。加入東協後和其他經濟水準相對較高之會員國的互動日益增加，比較之下更加深民衆對政府的不滿。他們的不滿再加上實施市場經濟後所產生的貧富不均以及高物價，終於導致一九九七年八、九月在北越太平（Thai Binh）省所發生的農村暴動。<sup>①</sup>這場農村暴動起因於地方政府向小老百姓徵收特別稅捐以支付許多工程建設費用，民衆懷疑有貪污情形，在五月時就曾經向中央陳情，在沒有得到答覆以後才發生暴動。此事顯示出中央領導階層的無能，也間接造成九七年底越南領導階層的新陳代謝。

至於在經濟面的衝擊就更大。越南自一九八六年越共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就開始採取開放改革（doi moi）政策，逐步走向市場經濟。<sup>②</sup>一個國家要從共產主義經濟走到資本主義談何容易，越南也不例外。光是要採取什麼模式就夠越南花費許多時間和社會資源去摸索學習。譬如越南長期以來一直是採取蘇聯的統制經濟模式，一九八〇年代後期轉向中共的發展模式。<sup>③</sup>最近幾年來越南被日本和南韓所實施的「管理式資本主義」（guided capitalism）所吸引，然而此次金融危機又讓日韓模式亮起紅燈。<sup>④</sup>雖然一再改變學習的對象，似乎越南仍然沒有找到適合本身發展的方案。

越南的改革政策大致包括下列幾個重點：一、透過市場機制減少官方與黑市的匯率差價；二、實施外國投資法使外資得以匯出；三、國內私人公司得以和國營企業競爭；四、國營企業經營不善者得以關閉；五、大學可以和國外機構往來以及進行合作計畫，並不需要政府事先核準；六、農民可以向政府租地並且以市場價格出售農產品。<sup>⑤</sup>從這些改革內容來看，都是以經濟開放為主，並沒有牽涉到政治層面的改革。雖然如此，越南在政治方面也往多元化方向逐步邁進。譬如說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的自主性日益增加，新聞報導的尺度有較大幅開放等。<sup>⑥</sup>

註①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 9, 1997, p. 4; Sep. 15, 1997, p. 1.

註② 越南本身出版的著作也承認一九七六年越共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所制訂的國內經濟政策犯了重大錯誤，錯誤的認為越南的社會經濟落後可以經由大規模社會主義生產來克服。這些錯誤一直到一九八六年時才轉向資本主義。參閱 Nguyen Khac Vien, *Vietnam: A Long History* (Hanoi: The GIOI Publishers, 1993), pp. 386~400.

註③ 越南尋求經濟發展模式的對象和對方之雙邊關係息息相關。在統一後到一九八〇年代蘇聯仍然是越南最大的金主時，越南以蘇聯為師；等到蘇聯瓦解後，新的俄羅斯「甚至不同情越南」，而越南卻因入侵柬埔寨事件被國際社會所譴責後，和中共關係大幅改善。再者越南看到蘇聯式改革導致政權崩潰的前例，以及中共逐步改革經濟卻抓緊政治的成功模式，就於一九八六年的第六屆越共全國代表大會後逐漸轉向中共模式。相關資料可參考 Frank Frost, *Vietnam's Foreign Relations*, pp. 24~40.

註④ *Asiaweek*, Apr. 3, 1998, p. 24.

註⑤ Dan Ton That,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ya Than & Joseph L. H. Tan, eds., *Vietnam's Dilemmas and Opt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3), pp. 32~36.

註⑥ Gareth Porter, "The Politics of 'Renovation' in Vietnam,"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9, No. 3 (May-June 1990), pp. 81~82.



經過十年左右的改革，成敗互見。在經濟成長率方面，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六年平均為 8.1%，遠超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八年平均的 4.9%。最近五年的物價指數平均上漲率為 9.1%，和一九八〇年代的平均超過三位數來說是大有進展。<sup>⑤</sup>這顯示出越南在從共產主義轉往市場經濟的努力上有初步的成效。可是另一方面，現階段越南經濟面臨到許多困境。其中最嚴重的是國營企業虧損連連以及投資環境的惡化。越南有五千八百多家國營企業，多半是無效率、產品沒法和其他非國營企業或外國企業之產品競爭，多靠政府補助或專賣賴以為生。唯越南政府仍然基於意識形態考量繼續維持國營企業。實際上國營企業占越南國民生產總額（GDP）的比重仍然持續上升，從一九九〇年的 32.5%到一九九六年的 42%，主要歸功於和外資的合作。<sup>⑥</sup>一九九七年初時保守派的越共總書記杜梅聲稱越南推行經濟改革將不會忽略共產主義，國家目標是要實現『國營資本主義』。<sup>⑦</sup>然而半年後改革派的總理潘文凱上台後宣布要整頓國營企業，國營企業必須與私營及外資企業在同一基礎上競爭。<sup>⑧</sup>幾個月後新越共總書記黎克飄又重申國營企業的領導角色（leading role）。<sup>⑨</sup>在越南領導人都沒有產生共識要如何處理國營企業之前，可以想見這問題仍將拖下去，而且除非政經生態有重大改變，國營企業這個毒瘤勢必影響整體經濟發展。

另一個嚴重問題是越南投資環境的惡化。越南近年來經濟情況大幅好轉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以廉價勞力大量吸引外資，把外資企業視為帶動經濟成長的主力。最誇張的一九九六年越南所通過外來投資總金額達 88 億美元，竟然占當年國內生產毛額的三分之一強。<sup>⑩</sup>過多的外資已使得國營企業為主的本國企業陷入苦戰，並引起共黨內部保守勢力的不滿，使保護主義日漸抬頭。各級政府官員在應付外商立場越來越強硬，甚至有排外的態度。有的官員還表示，部分外資企業撤離越南，是一種正常的現象，想取代者也不少。<sup>⑪</sup>這使得外商近年來叫苦連天，投資金額也在一九九七年下降一半。<sup>⑫</sup>這又造成政府領導人的緊張，再準備進行新階段改革以吸引外資。政府政策就一直擺來擺去，讓商人無所適從，也引來許多批評。連前幾年一直贊揚越南改革成效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IMF）也轉向批評，並且在經濟援助方案中附帶要求更多的改革措施。<sup>⑬</sup>

加入東協以後對越南經濟方面的挑戰更為嚴峻。東協各國在一九九二年所舉行的第四次東協高峰會中宣布將在十五年（二〇〇八年）內組成東協自由貿易區（ASEAN

註⑤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IMF Publication Services, 1997), pp. 26~27 & p. 155, p. 163.

註⑥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 12, 1998, p. 52.

註⑦ 星島日報，一九九七年三月七日，版 B 十。

註⑧ 星島日報，一九九七年十月三日，版 B 五。

註⑨ *The New York Times*, Dec. 31, 1997, p. A9.

註⑩ 經濟日報，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日，版八。

註⑪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版十七。

註⑫ 經濟日報，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日，版八。

註⑬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 23, 1997, p. 8.





Free Trade Area, AFTA)，將區域內的貿易壁壘降到最低的程度。<sup>④</sup>隨後更將期限提前到二〇〇三年，不過這個目標勢必因為東南亞金融風暴的發生而有所修正。至於新加入的越南，則分成數階段於二〇〇六年時正式融入 AFTA。越南政府已經在一九九六年宣布 857 種商品的進口關稅降至 0 到 5%，也確定到二〇〇六年將有 1628 種商品關稅降至此一水準。<sup>⑤</sup>儘管這些商品只占所有進出口貿易商品的一小部分，越南如何來和經濟發展水準較高之東協其他會員國產品競爭？越南又如何能建立自己的民族工業體系？這些都已經夠讓越南領導人頭痛了。

其實綜觀目前越南經濟發展所面臨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找到一位有魄力的領導人，來改革越南原有的經濟沉痾、來轉型老大且無效率的國營企業、來建立一套適合國內外企業家發展的經貿法規、以及整頓各級政府官員的貪污腐化。換句話說，越南所需要的可能是一位「越南的朱鎔基」，才能夠把問題重重的越南經濟，做一番徹底整頓，並且制訂出前後一致的政策。<sup>⑥</sup>可是這在講究革命輩份、凡事尋求妥協共識、尊重各派系本位主義的越南政治生態來說，要產生如此的領導人，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肆、越南新領導人的產生和政策風格

歷經一年半的延宕後，越南終於產生一批新的領導階層，他們分別是一九九七年十月獲選的國家主席陳德良，總理潘文凱，以及同年底被選上的越共總書記黎克飄。這三位新領導人和以前領導人最大的不同是他們是一九九一年越共七屆全大後，才逐漸在政壇上展露頭角的「少壯派」人士，和以前的「創黨元老」、或者像杜梅、阮文靈 (Nguyen Van Linh) 之類早於一九六〇年就進入越共中央委員會有明顯的時間差距。<sup>⑦</sup>這種領導階層的集體新陳代謝，在一九八六年的越共六屆全大也曾經發生過。當時的背景是原本實施的社會主義政策遭受重挫，以及蘇聯戈巴契夫上台後對於越南軍、經援的減少，透過越共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全面改組以便進行改革開放政策。<sup>⑧</sup>

不過此次領導階層大幅更換拖延時間過久，人選也頗出人意表。越共第八屆全大於一九九六年六月召開時仍然選出杜梅、黎德安 (Le Duc Ane)、武文傑 (Vo Van Kiet) 三人繼續擔任其後五年的越共總書記、國家主席和總理之職位。國外學界與傳播界對於八屆全大的評語大致是與會者希望經濟改革持續進行，但是將會採取更謹慎

註④ 相關資料，參閱 Narongchai Akrasanee & David Stife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and Sree Kumar, "Policy Issu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in Pearl Imada & Seiji Naya, eds., *AFTA: The Way Ahea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pp. 27~47 & 71-94.

註⑤ 經濟日報 (北京)，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七日，版四。

註⑥ 本文在此提出朱鎔基，並非認為他所實施的各種政策十分正確，朱鎔基的政策成敗如何，需要後世史家去做評斷。作者是認為朱鎔基大刀闊斧的魄力是一位治國者所最需要的，也是越南這種政治生態下所最缺少的特性。

註⑦ 有關越南的老人政治，可參閱 Gareth Porter, *op. cit.*, chapter 4.

註⑧ 在那次改組中，原來的元老長征、范文同和黎德壽 (Le Duc Tho) 都自願退出第一線，由新人接手。



的路線；同時也拉拔一些更年輕的新血進入領導階層。<sup>③</sup>以最具影響力的五位政治局常委來說，除了前述三人，還包括中生代的黎克飄將軍、以及年方四十七的內政部次長阮進勇（Nguyen Tan Dung）。<sup>④</sup>照這個布局看，應該是準備在其後五年間好好訓練年紀較輕的黎、阮二人，再逐步交班給少壯派領導人。是什麼因素使得交班計畫提前實施呢？

最主要的因素可能牽涉到越南式集體領導之特質：它必須要能夠平衡地域、權力派系與政治理念的差異。<sup>⑤</sup>越南前一任三頭馬車杜梅、黎德安、武文傑分別代表越南的北部軍方溫和派、中部黨利益之保守派和南部改革派。<sup>⑥</sup>那麼在這一任的三頭馬車自然也應該代表各方的勢力才行。然而軍方出身的黎克飄將軍似乎不能得到軍方完全的認同，而黎的強烈企圖心和威權作風也為一般黨代表不放心，因此在一九九六年的八屆全大時無法順利接班。<sup>⑦</sup>而在當時接任國家主席呼聲甚高的外交部長阮孟琴（Nguyen Manh Cam）也因為派系因素以及與另外一位競爭者國防部長段奎（Doan Khue）相持不下而無法出線。<sup>⑧</sup>因此整個領導階層的換手就此拖延一年多。

黎克飄知道他接班最大的障礙是國防部長，因為二人都是軍人，在現階段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不可能在三頭馬車中居其二。只有把段奎擊倒才能穩坐總書記寶座。另一方面段奎一派人馬也知道絕不能讓黎接班，否則己方就無法在政壇立足。雙方人馬就在一九九七年底的越共八屆四中全會之前積極運作，因此發生遠東經濟評論記者 Faith Keenan 報導第三者黎文安將接任總書記的事件也就不足為奇。<sup>⑨</sup>不過黎在杜梅的支持下還是取得上風。他們分二階段布局。第一階段在九七年六月的越共八屆三中全會時，將二位形象良好、較無爭議的經濟官僚潘文凱和陳德良補上總理及國家主席職位。當潘、陳獲得多數與會代表的同意後，和陳同屬於中部人的段奎就已經出局了。<sup>⑩</sup>到第二階段九七年底時黎才順利接班。事實上段奎於總書記一戰失敗後連國防部長也沒了，在潘文凱內閣成立後已經退居第二線。

註③ Lewis M. Stern, "Vietnam's Eighth Party Congress," *Asian Survey*, Vol. 37, No. 5 (May 1997), pp. 477~480.

註④ 阮進勇自從進入政治局以後前途看好，目前已是潘文凱內閣中的第一副總理，主管經濟與內政事務。遠東經濟評論記者即認為他是可能接任潘文凱的繼任者之一。*FEER*, Feb. 19, 1998, p. 60.

註⑤ *The New York Times*, Dec. 31, 1997, p. A9.

註⑥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ly 3, 1997, p. 26.

註⑦ *Ibid.*, p. 26.

註⑧ 軍方在國防部長強烈運作下不是全面支持黎克飄接任總書記，因為這樣會使得軍方沒有理由再擔任國家主席一職。他們所支持的是同樣是北部人的親改革派阮文安（Nguyen Van An）。如此代表中部人、軍方的董秋就可以接任國家主席。不過阮文安的親改革派立場會讓三頭馬車倒向改革派，而不被保守派接受。

註⑨ 參閱註①。

註⑩ 這些互動是作者根據媒體相關報導所做的沙盤推演，真相如何還有待史家驗證。實際上以一個十分閉鎖的國家來說，要瞭解高層政治的互動實情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這也可以解釋國際知名媒體偶而被利用發布錯誤訊息。



越南的三位新領導人仍然是代表地域、權力派系及政治理念的組合。黎克飄出生於北方清化省，長期擔任人民軍政治部主任並且主掌意識形態，被媒體普遍認為是保守派。從九七年底即將接任總書記一職前，黎在越南社會人文科學院發表一篇演講中，可以看出他和過去老一輩領導人一樣有很強烈的民族獨立和自主意識。他強調國家的政治與社會穩定，極力提倡共黨政府的治國權威。在演說中他還提到越南必須注意目前世界上的一種新的殖民主義，即西方國家藉助經濟力量，以全球一體化的訴求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現象。<sup>④</sup>至於陳德良出生於中部廣義省，曾經赴蘇聯研究經濟管理學，回國後主管科技開發工作，是一位科技官僚。他的意識形態較傾向於溫和改革派。而潘文凱則是胡志明市人，留學蘇聯國民經濟大學，統一後即擔任多項黨政要職，長期負責經濟改革事務，是一位立場堅定的改革派。<sup>⑤</sup>不論從這三位領導人的經歷與治國理念來看，都是南轅北轍。很明顯這是越南式集體領導及派系妥協下的產物。

這三人組合所代表的含意是越南在開放改革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問題，甚至有可能威脅到共產黨在越南的繼續執政，因此在各方都期待越南政府能夠持續做出更多政治與經濟改革之時，越南共黨選出黎克飄將軍來制衡改革派，也將會採取較保守及穩健的經濟政策來應付未來的挑戰。同時越南領導人並且極力避免所謂的「和平演變」(peaceful evolution)的發生。黎不只一次在公開場合指出和平演變是越南最大的威脅，將會嚴重危害到越南共產黨。<sup>⑥</sup>他的說法和中共領導人的說法如出一轍，由此點可以看出越南以中共為師的情況。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軍方在越南政壇的影響力大幅增加。黎克飄是第一位擔任越共總書記的軍方人士，加上許多軍方和情治單位人士在越共八屆全大時進入越共政治局，這在一向採取以黨領軍的越南共產黨來說是很少見。這也反映出越南政府公務員貪污腐化情況嚴重，招致廣大民怨；而形象較好的軍方則藉機擴大影響力。不過軍方勢力過度膨脹，不論對於開放改革的持續擴大與走向政治民主化之路，都是不好的徵兆。

## 伍、結論：越南政經發展的前景

經過這次領導階層的新陳代謝，越南的政治生態產生重大改變。過去掌控越南數十年的老人政治(geronpolitics)隨著那些革命元老的去世或退隱已經是過去式，越南即將在未來數年內走向以技術官僚為主的領導模式。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多元化與經濟自由化的趨勢已屬必然，不論軍方或者是意識形態取向的保守派人士都只能做煞車或制衡的角色，對內往開放改革、對外更進一步融入區域經濟整合的大方向已是越南不可避免的一條路。可能的變數僅僅是時間的快慢與規模的大小而已。以總書記黎克飄為例，就算他的政治理念再保守、意識形態再正確，如果不能滿足老百姓的生活需

註④ 明報，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版A十五。

註⑤ 有關這三位領導人的簡歷，參閱明報(香港)，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版A十五。

註⑥ *The New York Times*, Dec. 31, 1997, p. A9.



要，幾場暴動或者示威罷工下來，他也必須要解決問題，不然就會被迫下台。如果試圖要回到以前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事了。主要是他們以前走過這條路，知道不可行。從這個角度看，越南和中共老大哥似乎走的是同一個模式，所差的僅是程度而已。

不過現在就要認定越南在很快的時間內將會走上政治民主化這一條道路，則言之過早。以越南共產黨在越南長久的歷史、獨特的地位和長期的掌權，中短期間內要叫共產黨主動放下權力，顯然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另一方面，越南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比七十年代的共產社會要好得多，除非政府政策出了大問題，不然人民也都會珍惜現狀。因此逐漸的越南會向東亞過去所盛行的發展模式靠攏，這模式的特徵是亞洲式（尊重權威、資深者）的威權政治提供了政治穩定，進而產生了快速且持續的經濟發展，經濟成長再反過來合理化威權政治。這其中，許多東亞國家的選民願意容忍某種程度的政治不民主，惡質的金權政治，甚至公務員的貪污腐化。因為他們或多或少已經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sup>⑩</sup>反而是如果執政者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將會是被人民背棄的最主要因素。Lucian W. Pye 在一九九七年的一篇探討東亞金權政治與民主轉型的文章中，以日本、南韓、中國大陸等國為例說明兩者之間的關係有正面者如日本和南韓，金權政治會促進民主轉型；也有不太確定的如中國大陸。Pye 指出在中國金權政治已經產生一種公司主義（corporatism）有助於經濟成長，<sup>⑪</sup>然而民主的前景目前仍不確定，有待時間的考驗。<sup>⑫</sup>越南的情形和中國大陸頗為類似，從經濟開放到政治民主似乎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展望未來，越南可能在未來十年內逐漸走向印尼過去所實施的政經發展路線。也就是說今後越南將會致力於經濟發展，政治上越南共產黨則仍然不肯放手。可是因為缺乏監督制衡的機制，貪污、錯誤政策和無效率的國營企業仍然會影響經濟成長的品質，也會使越南在不定期內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非常高。至於在政治上的自由化與民主化則要再等一段時間，等到有越來越多的私營企業甚至中產階級出現才有可能。二〇〇六年越南加入東協自由貿易區將會對越南內部產生更大的衝擊，屆時才有可能加速刺激政治上的改革。

\* \* \*

（收件：87年4月27日，修訂：87年5月11日，接受：87年5月12日）

註<sup>⑩</sup> 此觀點可參閱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11, 1997, p. 5.

註<sup>⑪</sup> 在中國大陸數以萬計的鄉鎮企業和國營企業，其領導人也常常是當地的官員。因此 Pye 認為這是亞洲式的公司主義。Lucian W. Pye, "Money Politics and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in East Asia," *Asian Survey*, Vol. 37, No. 3 (Mar. 1997), p. 226.

註<sup>⑫</sup> *Ibid.*, p. 227.



# The Vietnamese New Leaders' Political Dilemma and Future Outlook

*Rong-Yung King*

## Abstract

A new generation of the Vietnamese leadership has emerged since the end of 1997 to replace the old "orthodox, revolutionary" leadership which had occupied Vietnamese politics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t the same time, both Vietnam's politics and economy have faced severe challenges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se challenges and analyzes bot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in the future, the Vietnam economy will be further integrated with ASEAN countries, but Vietnam's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Keywords : Vietnam politics, Vietnam's political struggle, Vietnam and ASEAN, the South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